

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欧阳向英 李 燕

提 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全球治理缺位和全球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由此引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益分配和政治主张上的矛盾更呼唤全球治理领域进行深刻的变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其原则、主张和途径等内容是逐渐清晰的，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和担当。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基本准则应建立在各国共识基础上，对本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给予准确界定，增信释疑、共谋发展。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权利与义务相平衡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加快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核心要素，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关键词：全球治理 全球化 国际关系 顶层设计 新时代对外开放

作者欧阳向英，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燕，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表明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危机的困境。究其根源，是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三大突出矛盾是，世界经济下行，全球治理缺位，全球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在多个国际场合，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新的全球治理观，旨在改变全球治理原有的动力、模式和方法，为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开出“药方”。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其原则、主张和途径等内容是逐渐清晰的，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和担当。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新理念。他强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2016年9月3日，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前夕，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呼吁G20成员应立即行动，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2017年，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开幕式发表主

旨演讲，其中关于全球治理的新主张引起世界舆论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一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二要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三要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四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①在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应该深化在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应该合作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加快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各国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②2018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准确把握未来10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大势，明确提出“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主张，为金砖国家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彰显了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的责任担当。2019年，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治理思想的阐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对外交往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全球治理提出的背景

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首要变化是生产跨国化，产品的设计、加工、组装等生产过程通过分布全球的网络来完成，这也使得世界经济在生产领域呈现分散化和碎片化状态。全球生产的管理控制在跨国资本手中，且基本上都被西方跨国资本与跨国公司掌握。跨国资本通过相互直接投资、国际并购等手段，将金融资本的触角伸向世界每个角落，从而在经济上掌控世界。世界经济面临分化、分裂和不可持续的局面，美欧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相结合严重威胁世界经济开放、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处于最危险的时刻。^③

一是世界经济下行，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001-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为5.3%。2009-2015年，该数字是3.3%，同比下降了37%。2016年世界经济增速更降到3.08%。世界经济低迷具体体现在：投资低迷，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投资还是对外直接投资都明显降低；贸易低迷，2008-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大幅下滑，且落后于全球GDP增长速度；油价低迷，石油需求锐减，全球油价“跳水般”下跌；物价低迷，大部分国家通货膨胀率低于2%，全球通货紧缩压力增强；利率水平低迷，全球利率水平从危机前的8%狂跌到-1.5%。^④概括起来，现阶段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可归纳为“三低”，即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是资本主义时代前所未有的低增长格局。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出现了回暖势头，但本质上，这种复苏增长不完全由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拉里·萨默斯、保罗·克鲁德曼、奥利佛·布兰查德等指出，全球经济可能已经面临长期停滞风险。世界经济新一轮发展周期的核心是亟待新动力，亟待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科技创新、产

① 《习近平畅论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人民网，2017年1月18日。

② 习近平：《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30页。

③ 夏先良：《开创世界经济开放、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新局面——“一带一路”的划时代战略意义》，《学术前沿》，2017年第9期。

④ 李晓、丁一兵：《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

业创新等新的发展引擎。

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势下，原有的全球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全球经济秩序也被破坏。全球经济放缓中，不同经济体放缓速度有快有慢，以三个层次拉开了距离：第一层次是继续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减速趋势较为平缓；第二层次是以欧美主要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减速趋势较为明显；第三层次是经济陷入衰退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巴西，经济进入衰退状态。三个“梯队”之间经济增长速度相差悬殊，凸显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长放缓速度不均衡所产生的矛盾。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要求全球治理结构转变。

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而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全球金融体系高度活跃，资本运动犹如脱缰野马，经济体系严重失序。发达国家掌控全球金融资源，少有监管与制衡，世界金融链条形成系统性风险。同时，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速度远超过经济一体化进程，一旦出现危机便会迅速波及全球，引起汇率、利率、大宗商品物价的剧烈波动和资本流动的激烈变化，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实现间接的风险外溢。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为挽救困局，各国政策交织难解，紧缩和量宽政策配置混乱，内生与外在增长动能相互冲突，世界市场在贸易保护主义中被分化切割，全球经济体系陷入无序。

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发达国家掌握着主要话语权。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①尽管近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80%，但这种变化在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中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全球治理结构不能很好地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必然呼唤全球治理体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在国际利益分配格局中取得更优位势。

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二战后，大量军用技术转为民用，电子信息技术、喷气式飞机、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等技术的快速发展重塑了世界产业发展的格局，国与国之间过去的贸易关系转变成以“跨国制造”为核心的经济联合体。这种模式在世界经济体系下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只是流到了少数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这些受益群体主导了现今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格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驱动下，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以来所形成的“核心—边缘”的单极化全球经济地理结构正发生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 9.7%，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成为辐射亚太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世界经济呈现出多极化发展态势。同时，国际贸易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在全球货物贸易领域，发达经济体持续贸易逆差，发展中经济体持续贸易顺差，反映出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特征。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出现的货物贸易持续顺差，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全球制造业中心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散的现实。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投资格局也发生改变，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投资

^① 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6 页。

的吸引力增强。原有的全球经济体系均衡被打破，不同经济体之间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领先发展的优势获得的不平等贸易条件占有了落后国家更多经济利益和资源的商业、政治、科技以及文化活动仍在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发展差距日益拉大。各民族国家、民族资本、民族居民之间在利益上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又存在深刻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民族资本的利益矛盾加深了民族矛盾、种族矛盾、社会矛盾，特别是大国利益博弈可能激化大国矛盾，甚至引起国家安全严重缺乏信任，引起激烈冲突。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阶层之间财富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等，只有少数人从繁荣之中受益，享受过度财富，大多数人受穷，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民族冲突、地区战争以及民粹主义在世界多国兴起。欧美发达经济体自我封闭和日渐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世界经济发展遭遇严重打击，对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损害更加严重，削弱其发展能力，加重经济落后国家人民的苦难。许多经济落后国家被一定程度上阻挡和隔离在欧美自我保护的大市场之外，难以参与全球经济资源均衡配置，结构日益失衡，进出口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缺乏竞争优势，国际收支面临严重赤字的困境，导致基础设施落后，教育、医疗、体育等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经济过度依靠农业和采矿业，国民收入偏低。同时，一些不愿意开放市场的发达国家在分化、分裂的世界市场上配置资源也十分不充分，经济效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发达经济体日益偏向服务化、虚拟化、空心化，出现增长疲软、缺乏动力和不可持久的局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世界贸易萎缩，从而使世界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分化、失衡和不可持续状态。^①

全球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带来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的“危险线”。^②在一些落后地区贫困与饥饿仍威胁着人们，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对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收入不均等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全球治理基本准则应凝聚各国共识

全球治理是在全球范围内对全球政治——经济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必然反映各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关系，反映各国的国际关系理念和主张。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基本准则应建立在各国共识基础上，对本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给予准确界定，增信释疑、共谋发展。

独立自主与开放共赢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前者强调的是经济主权上的独立与完整，而后者是操作层面的策略，两者并不矛盾。目前，这一准则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体现得并不充分，或被片面地表现出来，如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扬言退出WTO，就是典型的例子。一般认为，上述两例表明全球化进程受挫，反全球化、反建制化占据上风，其实不然。首先，国际化、一体化和全球化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三个层次。英国脱欧是对欧洲一体化的阻断，表明欧盟的经济状况和财政政策出现了问题。英国采取自保的措施是独立自主意愿的表达，但缺失开放心态能否让英国经济长期

^① 参见夏先良：《开创世界经济开放、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新局面——“一带一路”的划时代战略意义》，《学术前沿》，2017年第9期。

^② 参见《习近平谈经济全球化》，人民网，2017年1月15日。

稳定发展，仍需观察。其次，特朗普扬言退出WTO，并不是想让美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是以此为筹码讨价还价，目的是实现更大程度的获利了结。美国的政策从来以捍卫美国利益为宗旨，少了共赢的胸怀，是其逐步失去世界领袖地位的行为根源。最后，无论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的利己主义政策，都违背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并不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因为全球化是由更深刻的内在动因和历史规律所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过，竞争是实际的贸易自由，而保护关税在竞争中只是治标的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段。^①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范围内金融霸权主义仍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本来就非中性的国际制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继续向既得利益者倾斜，全球化困难重重。中国要融入经济全球化，但全球化只是中国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的一种手段，并非目的，不应为全球化而全球化。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应有一定的弹性，既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又有开放共赢、公平包容的气度。首先立足国内，解决好国内问题，然后才是以适当的规模和速度进行对外经济关系的深化与拓展，这是保持大国经济和战略独立性的基础。

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不干涉别国内政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上的差异。中国与世界的政治交往有和谐，也有斗争，维持同一性的关键就在于坚持国际民主原则。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在当下的国际政治实践中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多数国际组织都是大国俱乐部。不干涉别国内政有两条含义，一是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二是也不允许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各国得以和平共处的法宝。中国一不输出贫穷，二不输出革命，外国没有理由干涉我们的内政。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不看社会制度，而是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既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计较历史恩怨，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些都应成为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

保卫世界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是国际安全关系的基本准则。世界和平不可分割，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斗争也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这是国际安全关系的特点。东欧剧变后，世界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局势总体走向缓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超级大国操纵国际事务的局面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世界各种矛盾也在深入发展，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日益突出，甚至酿成流血事件和局部战争。营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强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强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公认的国际准则，成为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习近平主席的新国家安全观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倡导求同存异，而不是你死我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形成共识。只有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才能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中国的长治久安。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中国将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同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通过平等协商处理矛盾和分歧，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坚持对话解决分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公共产品。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页。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框架

如何使全球治理摆脱现有困境,当今世界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是“退”——退回到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表现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此起彼伏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回潮,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另一种是“进”——以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路改造现有机制,将经济全球化发展置于更加公平、合理、包容、共享的制度框架内,完善全球治理。一度是经济全球化旗手的美国成了一个负面典型,不择手段地推动“去全球化”进程。与此同时,在欧盟里程碑文件《罗马条约》签订60周年之际,英国政府在2017年3月正式启动“脱欧”,欧洲一体化开倒车;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都试图借“反全球化”谋求上台执政。在反全球化甚嚣尘上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坚定地指出:“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①中国提出一系列完善全球治理的理念和主张,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框架逐渐形成。

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目前,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两个基本身份定位。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逐渐承担合理的国际责任。这既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具体展示。另一方面,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应把维护自身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既要看到自身发展对世界的要求,同时也要看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因此,中国应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不断提高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并保护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利益免受损害。

“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商、共建和共享是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系统链条,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有机体系。共商,意即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重点领域、规则机制、发展规划等都由所有参与方共同商议并形成共识;共建,意即发挥各方优势和潜能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共享,意即各参与方公平分享全球治理的成果和收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倡导集思广益、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成果共享,充分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潮流。践行这一理念,就是要充分发挥所有行为体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体现各方关切和诉求,更好地维护各方正当权益,让所有参与方对完善全球治理拥有更多获得感。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不仅致力于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还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所有这些均与国际规则或机制密切相关,都涉及全球治理的不同维度。从国际层面看,“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模式创新的积极贡献,符合国

^① 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际社会的根本利益。从国内层面看，“一带一路”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抓手，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全球治理增添了新的正能量，更是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责任。

权利与义务相平衡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权利与义务相平衡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倡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正在并将持续满足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需要。在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同时，中国也需要享受与之相匹配的权利。在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各种规则和机制的主导者，也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最主要的受益者，而广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却难以享受公平待遇，也难以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影响力。坚持正确义利观，逐步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既是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为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是当前重点

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经济治理特别要抓住以下重点：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加快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核心要素，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第一，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内容广泛，但国际金融机构及其合法性、实用有效的多边准则、全球流动性、国际储备货币和汇率问题构成最主要的优先事项。在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疲弱并面临很多风险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应以国内价格稳定和经济复苏为目标，并尽量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各国要继续落实金融部门改革和结构改革的政策承诺，促进需求再平衡，推动全球经济尽快复苏。要尽快落实IMF份额和治理改革，重审份额分配公式，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否决权，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质性转移投票权，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决策权与经济体量相匹配；加大对国际基本流动和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督预警，推动建立全球流动性指数，落实支持本国货币市场发展的行动计划；进一步完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的作用；修订公共债务管理，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稳定、更可预见、更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全球经济能有效地预防和抵御未来危机的冲击。

第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目前，全球经济有复苏迹象，但仍未彻底摆脱下滑险境。各国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是建立彼此间互信与合作的必要前提。贸易保护主义非但不能解决危机，反而可能加剧世界经济困境；反对保护主义、巩固和发展多边贸易体系及创建公平合理的全球价值链将为提振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动力。应将发展贸易和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既定目标提供先决条件。共同维护世贸组织在推动贸易

自由化和协调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方面的主渠道地位，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开放、透明、包容和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区域贸易协定应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而不是其替代；支持增强区域贸易协定的透明度，保持其开放、包容并与世贸组织规则相一致。

第三，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中国是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形成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给体系，对全球气候变暖和全球能源格局持积极的治理态度。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顺应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中国提出推动能源生产、消费、技术和体制革命，以绿色低碳为方向，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能源治理新格局。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务实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加大中亚、中东、美洲、非洲等油气的合作力度。增加油气等能源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市场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建立能源效率和“绿色”发展激励机制，合理控制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切实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天然气在亚太地区能源结构中的份额，适时启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生物质能和海洋能等新能源项目，确保核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的安全利用和合作共享，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

第四，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南北之间存在不平等交换，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就是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价值转移过程。正是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边缘的财富不断地流入中心，从而造成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不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对立，而是不发达与发达的对立，二者是同一历史进程的结果。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自身的发展经验证明，发展中形成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各国应协调推进广泛、开放、互利合作的各类国家级、地区性和全球性安排，合力维护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各国应着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落实工作沟通协调和经验交流，共同支持联合国在全球落实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深化全球发展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繁荣进步。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利益紧密相连，过时的零和思维必须摒弃。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①各国人民应携起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责任编辑：孙艳兰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